

弃权还是否决*

——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中表达反对立场

漆海霞 张佐莉

【内容提要】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中,同样是表达反对意见,有时选择弃权票,有时则选择否决票。为了分析这一问题,作者研究了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到2012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的相关数据。在此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数量为1797个,中国在安理会一共投了137次弃权票,9次否决票。作者根据相关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发现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不同意时会倾向于通过否决票表示反对。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增长,通过社会化逐渐接受国际规范,也容易在不同意时以否决票来表示。若议题涉及主权或安全问题,中国在不同意时会倾向于投否决票。中国对于中东和非中东的亚洲事务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同,对于中东问题,中国的行为趋于风险规避;但是若涉及中国周边或中国自身,此时中国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面临损失,因此愿意冒险投否决票。以上发现表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不仅有自己一贯的立场和原则,并且具有“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传统思维特点。

【关键词】 中国对外政策;安理会;弃权票;否决票;联合国

【作者简介】 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张佐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

05-00101-23

* 本论文受到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ETP0148)。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关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更是中国立场的表征。2012年2月4日,中国在安理会的中东局势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上投了否决票。这一投票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重大反响,西方的媒体和学者对中国投否决票的行为纷纷表示不理解。^①为什么中国的一次正常投票行为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呢?笔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国际社会长期将中国定位为“弃权大使”,^②因此中国投否决票行为显然出乎大家的预期从而导致普遍质疑。

安理会的理事国在安理会决议草案的投票中有三种选择:赞成票、反对票(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通常被称为“行使否决权”)和弃权票。弃权票和反对票尽管程度不同,但在实质上均表达了当事国的不同意立场态度,只是反对票比较明确,而弃权票比较隐晦。若一国反对某一决议,且担心承担投否决票带来的压力,则往往会选择弃权。中国在联合国中由于投弃权票较多,被不少国家定性为“弃权大使”,那么这一称呼是否实至名归呢?如果仅凭借感觉进行主观判断容易出现偏误,本文将根据中国历次投票的数据,同时以其他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为参照,尝试分析中国选择弃权票和否决票的关键因素。

一 文献回顾

美国学术界较早就开始研究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从1946年起,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关于《美国参与联合国》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实践》的年度报告,^③美国国会也会举办相关听证会,发布《美国与联合国听证会报告》。^④从1985年起,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关于联合国投票表决情况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对系统研究联合国投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全球政策论坛^⑤和联合国网站^⑥上有详尽

① 详情参见《中国在联合国8次说“不”》,载《联合时报》,http://shsxz.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esj/u1ai62564.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18日。

② 此前中国驻联合国的一位大使就曾因中国频繁使用弃权,被外电戏称为“弃权大使”。《秦华孙大使回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http://news.163.com/10/0402/16/639FIK91000146BB.html,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5日。

③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http://www.state.gov/p/io/rls/rpt/,登录时间:2014年2月18日。

④ 美国政府和国会提交的报告: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earing: U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S Reforming,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⑤ 全球政策论坛网站:http://www.globalpolicy.gov。

⑥ 联合国文件中心网站:http://www.un.org/zh/documents/index.shtml。

的投票情况介绍和部分会议记录,这些都给研究者提供了数据来源。^① 中国关于联合国的研究有一些著作,不过大多是早期的研究,近期的情况没有及时跟进,而且缺乏对于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投票的系统研究,对各种投票数据的统计和整理工作也相对较少。这种对联合国投票研究的匮乏与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不相称的。^② 朱立群将对联合国投票的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模式分析,主要研究各国投票格局和趋势的变化;另一种是政策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主要研究某一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其他成员国投票行为的影响。^③ 下文将根据这一分类,将文献回顾分为四个部分。

(一)关于联合国投票模式的研究

联合国投票模式是指联合国各成员国在安理会中个体的投票行为从整体呈现出来的投票特征,包括投票的联盟特征、投票格局的变迁以及投票趋势的变化。

安理会是联合国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机构,且大国一致原则使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举足轻重,有学者统计了1946年至2012年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不同时期使用否决票的数量。^④ 根据数据,在安理会成立初期,苏联频繁否决,而美国则没有行使过否决权;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投否决票的次数相当;冷战结束以后,否决票大大减少了,各理事国在安理会的合作明显加强,英法冷战后迄今没有投过否决票。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对否决权的使用与各国差别较大:冷战时期,中国仅仅使用过两次否决票;而冷战结束后至2012年年底,中国投了七次否决票。显然,中国在冷战后投否决票的数量比冷战时期更多,但这一现象为何没有受到关注,国际社会反而集中关注中国投弃权票的情况? 冷战结束后只有中、美、俄使用过否决权,这也说明了冷战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不能仅限于对现有投票数量的简单计数,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有学者从总体上分析了投票集团的形成和演变,史蒂文·霍洛韦(Steven Holloway)运用多维尺度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简称为MDS)分析联合国大会投票集团(voting bloc)的演变。其发现是:从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开始,东西方的

① 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结果查询网址:<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session=1S32524RX0165.639113&profile=voting&menu=search&submenu=power&ts=1332524271875#focus>;联合国安理会不完全投票数据库: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session=13325041231R3.639107&menu=search&aspect=power&npp=50&ipp=20&spp=20&profile=voting&ri=1&source=%7E%21horizon&index=.VM&term=sres*&aspect=power&x=10&y=9#focus,登录时间:2014年4月5日。

② 朱立群:《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49页。

③ 朱立群:《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50页。

④ 详情请参见Global Policy Forum,“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Use of Veto in the Security Council,”<http://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02/32810.html>,登录时间:2013年10月8日。

投票集团就已经形成,在早期联合国很多决议案都是根据两个集团的意见而折中起草的。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会员国数量明显增多,第三世界投票集团开始出现,联合国大会的议题从关注超级大国的利益转为关注独立自主、反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史蒂文·霍洛韦认为,从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到1985年,共出现了三大投票集团:第一个集团是华沙条约集团,包括古巴、阿富汗、越南和叙利亚等;第二个集团是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简称为NAM)投票集团;第三个集团是西方或者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集团。这三个集团对联合国投票具有重大影响。^① 兰德尔·霍尔库姆(Randall G. Holcombe)与拉塞尔·索贝尔(Russell S. Sobel)对投票集团在特定时间段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依据投票一致性来检验投票集团的稳定性,发现在1947-1973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集团相对稳定,相比于国内政治,虽然联合国没有国内政党这种组织可以保持投票的稳定性,而且有些国家在此时期改变了政治体制(如古巴),但都没有破坏投票的稳定性。^② 霍洛韦与罗德尼·汤姆林森(Rodney Tomlinson)对冷战后的投票稳定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第45、46、47届联大的投票模式,他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的投票模式在冷战后已经终结了。^③ 如果说冷战后的各国投票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一员是否也在投票中产生了变化?中国投票的变化是否受联大投票集团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有研究表明,冷战后南北问题可能会取代东西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新特征。^④ 冷战前,联合国大会投票的重要问题是两极格局下的东西问题;冷战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不再是联合国大会的主要议程,而经济平等和发展、人权问题、前殖民地的民族自决、大国裁减军备和中东问题等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民族自决和裁减军备的议题,这反映了南方国家对新殖民主义问题的担心。根据不同问题类型,相关研究把投票集团分为四类:(1)不结盟运动集团;(2)日本和西欧;(3)西欧、以色列和美国;(4)苏联集团。作者之所以把西欧分在两种投票集团里,是因为在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上欧洲的态度与美国并不一致,但在其他问题上西欧和美国

^① Steven K. Holloway, "Forty Years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2, 1990, pp. 279-296.

^② Randall G. Holcombe and Russell S. Sobel,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alitions in United Nations Voting from 1946 to 1973," *Public Choice*, Vol. 86, No. 1/2, 1996, pp. 17-34.

^③ Steven K. Holloway and Rodney Tomlinson,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the General Assembly: Bloc Realignment at the U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2, 1995, pp. 227-254.

^④ 相关研究请参见以下两篇文章:Soo Yeon Kim and Bruce Russett, "The New Politics of Voting Alignmen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4, 1996, pp. 629-652; Erik Voeten, "Clashes in the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2000, pp. 185-215.

还是属于同一个投票集团。^① 文章认为对于常任理事国来说,因为拥有否决权,安理会要比联大更容易掌控。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投票联盟可能是相同的,但是投票结果却不一样。因为中国和其他常任理事国属于不同投票集团,所以中国会对那些挑战其底线的决议案威胁使用否决权,而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中国会依赖自己的投票联盟——不结盟运动集团。^②

以上关于安理会和联大投票模式的分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关于中国的投票研究较少。通过划分不同的集团我们可以分析中国在联大的投票,但是对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则难以进行充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二)关于国家类型与投票行为相关性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国家政体类型与投票行为有一定的相关性,民主与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分野能够影响国家的投票行为。一个国家越民主,越容易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投票一致,而非民主国家则不容易与民主国家投票一致。^③ 艾里克·沃顿(Erik Voeten)认为,冷战结束后,用西方-非西方国家的划分方式来理解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可以精确理解冷战后联合国的投票格局。非西方国家投票行为中出现了一些反对霸权的投票集团。沃顿也承认国家政体类型影响着国家的投票行为,1989年以后,民主国家的投票趋向于和西方一致,但是民主政体对国家在不同问题上投票的影响是不同的。民主国家在有关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议题方面投票更容易一致,而在其他议题上的一致性程度则不算高。^④

在以上研究中,西方-非西方国家、民主-非民主国家这两种国家分类标准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西方国家对应的往往既是发达国家也是民主国家,非西方国家在国家的富裕程度和政治体制上则不尽相同。学者们研究投票行为时,决定国家如何分类往往是看投票的议题:西方-非西方的分类更多的是对应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之间的投票行为,民主-非民主的分类更多的是对应不同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国家之间的投票行为。学者们也注意到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的投票集团,在另一些问题则可能不存在,所以在对投票集团进行分类定义的时候,有针对性地分析投票议题会更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① Soo Yeon Kim and Bruce Russett, "The New Politics of Voting Alignmen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pp. 629-652, p. 642.

② Soo Yeon Kim and Bruce Russett, "The New Politics of Voting Alignmen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pp. 629-652.

③ Strom C. Thacker, "The High Politics of IMF Lending,"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1, 1999, pp. 38-75.

④ Erik Voeten, "Clashes in the Assembly," pp. 185-215.

有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更加容易倾向于迎合其援助国的立场,^①因而援助国与被援助国的投票结果也更为接近。阿克塞尔·德歌儿(Axel Dreher)等学者通过对1970—2008年期间188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七国集团(G7)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确实可以提高受援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率。^②他们还尝试研究IMF的援助和当事国在安理会投票行为的相关性,并发现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意用在安理会投票的权利来换取在IMF的贷款,因为对于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得他国贷款往往更重要;而发达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要比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发达国家为了能够在安理会获得9票而顺利通过议案,也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做这样的交换。^③在发展中国家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期间,发展中国家得到的来自美国的援助比平时多1600万美元,得到的联合国的援助比平时多100万美元,而在有重要议案通过的年份这个数量可能分别达到4500万美元和800万美元。^④这些研究解释了在冷战后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国家间高度合作的现象。与之相应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待国家利益时,分别更看重哪方面的利益?如果确如研究所表明的,发达国家更关注国际安全利益,发展中国家更看重经济利益,那么中国在通往强国的道路上,早期强调经济利益,现在和未来是不是会更加注重国际安全利益?这或许也是影响中国投票行为的重要方面。

国家类型的分类方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因为类型相似的国家在一些问题上会有共同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感,而相同类型的国家在哪些议题上更容易达成投票的一致性呢?我们只是凭经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实际情况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正如上面的学者提到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援助而选择和发达国家投票一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只要有援助,发展中国家就会妥协自己的投票意志吗?那么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受到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国家外交政策与投票行为相关性的研究

有研究从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来解释不同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王杰在

① John Oatley and Bruce Russett,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32-436.

② Axel Dreher and Jan-Egbert Sturm, "Do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Influence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Public Choice*, No. 151, 2012, pp. 363-397.

③ Axel Dreher, Jan-Egbert Sturm and James Raymond Vreeland, "Global Horse Trading: IMF Loans for Vo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No. 53, 2009, pp. 742-757.

④ Ilyana Kuziemko and Eric Werker, "How Much Is a Seat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Worth? Foreign Aid and Bribery at the United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4, No. 5, 2006, pp. 905-930.

主编的《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否决权是如何诞生的,分析了从1946年到1997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和国内冲突的否决票。该书第七章讲述了中国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包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的基本情况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所投的否决票。王杰认为中国使用否决权的原则与立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受侵犯;立足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谨慎行事。^① 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在安理会如何投票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任何一个决议案的投票结果都可以用国家的其中一个外交政策来说明,但我们却无法判断外交政策对中国选择投弃权票还是投否决票具有怎样的影响。

较多学者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来解读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李铁城和钱文荣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美在联合国的政策以及中美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斗争与合作。^② 其中由朱立群撰写的第四章《中美关系与两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分析》分析了1989-2003年中国和美国在安理会投否决票的情况:美国在安理会否决票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7%,中国的否决票只占8%,这表明中国很少使用否决权这一大国特权,其否决权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维护主权原则上;此外,中国致力于维护安理会的合作,基本不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否决。朱立群认为,中国这种审慎对待否决票的态度与中国在外交上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有关。在一些涉及美国重大利益而中国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中国通常会选择弃权票。^③ 戴颖运用相关数据发现中美在冷战后并没有把联大当成两国博弈的场所,两国在联大的投票行为与中美关系的好坏没有相关性,投票主要遵循本国在既定议题上的政策原则,两国的政策原则差距越大,投票的一致率就越低。^④

用国家的对外政策来解释国家的投票行为是相对常见的分析方式,但是不同的对外行为可能受不同政策的影响,以上分析比较笼统。

(四)关于国际规范对投票影响的研究

有学者通过中国的投票行为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维和的态度和主权观念的变化。毛瑞鹏以中国1994-2004年在安理会关于审议创立维和行动的27次投票记录为事实

① 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41页。

② 详见李铁城、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章。

③ 朱立群:《中美关系与两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分析》,载李铁城、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第4章,第181页。

④ 戴颖:《冷战中中美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1991-2006年)》,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53页。

基础,发现这一期间主权原则和台湾问题是决定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议案中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① 还有学者用具体议案的投票行为来解释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化以及对国际危机干预态度的变化。^②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时,用中国在联大的投票行为来说明国际形象对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行为的重要限制。江忆恩认为,由于不喜欢成为国际组织中的输家,中国常常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以弃权票而非否决票的方式站在少数反对派国家一边。他强调中国不愿意被孤立,在赞成票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很难公开投否决票;反之,若赞成票较少,则中国可能愿意投否决票。^③

而为什么20世纪末的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象特别敏感,江忆恩认为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国内合法性问题,民众都把中国的国际声望看做是领导人合法性的指标;二是社会心理学(如一致性理论、社会偏好理论)的因素,即领导人对他们的形象很敏感,因而把国家形象与个人形象联系起来;三是认同理论,中国领导人把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出现的“负责任大国”的理解内化。^④

中国在联合国的行动显然会受到国际规范的影响,但是在不同阶段,中国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早期阶段,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要求较少。当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且中国实力不断增强,此时国际社会可能对中国的期望加大,要求中国所承担的责任也增多。因此,我们有必要按阶段进行分析。

二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一) 研究假设

根据前文的文献回顾,本文综合考虑了各种影响中国投票的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国在安理会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受到中国实力变化的影响。

① 毛瑞鹏:《主权原则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议案中的投票行为(1994-2004)》,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60页。

② 详情请参见以下两篇文章:Allen Carlson, “More Than Just Saying No,”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17-241; Kyle Beardsley and Holger Schmidt, “Following the Flag or Following the Charter? Exam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UN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1945-200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33-49.

③ 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51页。

④ 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51页。

当中国实力达到一定等级时,中国的否决票有增多的趋势。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的实力日渐增强,以往的投票模式与新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因此中国的投票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否决票开始增多。

假设2:中国在安理会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在两极格局下,中国容易投弃权票;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下,中国更容易投否决票。

国际格局对于大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时候,和苏联关系紧张,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刚刚解冻。由于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曾有交恶历史,且美苏两国以联合国为战场针锋相对,因此中国在表达反对态度时可能会比较谨慎,倾向于投弃权票。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不与美国对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联合国投票的选择空间增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明确通过否决票表示反对意见。

假设3:中国在安理会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受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社会化的影响。社会化时间越长,中国在国际组织内的行事风格会愈加受到组织规范和组织内其他成员国的影响。

两极格局下,美苏对峙,当两国意见有分歧时,往往会投否决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安理会其他国家选择弃权或者追随盟友。在冷战后的单极体系中,美国独霸,缺少各国约束,因此美国的否决票多于其他国家。而其他常任理事国行事也有一定空间,可能会受联合国规范的社会化影响。例如,2003年,法国和中国等国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反恐”战争。^①随着中国受国际规范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投票可能会趋近于联合国其他强国。

假设4:中国在安理会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受到决议案的性质的影响。对于主权和安全类的决议案,中国容易投否决票;对于其他领域的议案,中国则容易投弃权票。

对于主权和内政安全的高度强调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明显特点。在涉及主权问题时,中国一直主张要尊重国家主权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对于安理会和其他大国干预本国和他国事务有着高度的敏感性,江忆恩曾指出,“中国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最有力的维护者。它反对自由国际主义国家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任何努力”。^②因此,本文假设

^① 详情请参见:《俄法德三国关注伊拉克战争》,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4/14/content_830148.htm,登录时间:2013年5月13日。相关研究参见安惠侯:《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政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4页。

^② 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52页。

在主权和安全议题上中国更容易投否决票,而在其他议题上更容易投弃权票。

假设5:中国在安理会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与议案是否为中东问题有关。

中东问题是国际热点问题,中东地区至今仍然是冲突频发的地带。历史上大国一直在中东有着较为激烈的争夺,但大国势力的介入不但没有使得中东和平与安定下来,反而导致中东动荡愈演愈烈。由于中东问题的高风险性,中国长期不插手中东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容易投弃权票。安理会中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相对较多,所以考察中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观察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

假设6:中国在安理会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受到议案内容所涉及地区的影响。对于亚洲国家的问题,中国容易投否决票,而对于非亚洲国家的议案,中国容易投弃权票。

中国是亚洲国家,从身份认同角度和周边环境的重要性看,在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可能更加关心周边国家的发展动态。所以本文假设,中国对于有关亚洲事务的议案若持反对意见,可能会倾向于明确用否决票来表达。

(二) 变量操作化

对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本文将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因此需要根据假设,将变量操作化为可进行研究的指标。下面将分别介绍自变量和因变量。

1. 自变量

第一,中国实力。本文认为,中国的实力变化会影响中国投票。由于投票问题不涉及中国军事力量,所以本文选择的指标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单位为美元,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①

第二,决议案的性质。对于不同类型的决议,中国的态度不同。对于决议案的性质,本文按照议案内容是否为军事安全问题分为两类:军事安全类和非军事安全类。这一变量为虚拟变量,军事安全类决议案的赋值为1,非军事安全类决议案的赋值为0。

第三,中国受联合国社会化影响的程度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本文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时间越长,受到组织社会化的影响越大,投票行为会与联合国其他国家愈加接近。对于这一变量,本文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时间段为指标,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时间以年代为单位分成四组:1971-1980年赋值为1,1981-1990年赋值为2,1991-2000年赋值为3,2001-2012年赋值为4。同样,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可以由这个指标表示,冷战前后各国的行为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

冷战时期,由于中国先后与美苏交恶,所以投弃权票可以避免介入大国纷争。而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中,中国受到的体系压力大大减少,同时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在持反对态度时更容易投否决票而不是弃权票。若用前面的指标,则如果在冷战时期(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到1991年),赋值为1、2;如果为冷战后(1992年至今),赋值为3、4。

第四,中东问题。中东问题是国际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安理会工作的重点。本文把安理会的决议案分为中东问题和非中东问题两类,有关中东问题的议案赋值为1,非中东问题的议案赋值为0。

第五,议案是否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有关。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同时也是亚洲国家里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可能比较关注自己周边国家的事情。关于这一自变量,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有关的提案赋值为1,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无关的提案赋值为0。

2. 因变量

本文以中国在安理会表示不同意见时究竟是投弃权票还是否决票为因变量。这一变量是虚拟变量,若中国投弃权票,则赋值为0;若中国投否决票,则赋值为1。

三 中国在安理会投弃权票和否决票的统计描述

(一) 样本容量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时间段为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2012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里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数量为1797个,其中被五大常任理事国否决的决议草案为111个,15个理事国集体不投票的决议草案有32个,剩下的1654个决议草案则通过了安理会的投票。在这1654个被通过的决议草案中,有26个草案被非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被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的有256个。^①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首先,通过的决议草案占总数的比例高达92%,

^① 以上统计数据均为笔者收集的一手资料,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系统查询网站,通过对整个系统投票情况进行统计、分类和整理得出了各类投票结果的数量。这个系统收集了所有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包括15票赞成通过的和理事国投弃权票通过的决议案。可以查询到议案的主题、相关内容以及各个国家的投票情况。查询系统网址: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session=1332504I231R3.639107&menu=search&aspect=power&npp=50&ipp=20&spp=20&profile=voting&ri=1&source=%7E%21horizon&index=.VM&term=sres*&aspect=power&x=10&y=9#focus,登录时间:2014年2月20日。被否决的决议案则不在上面的查询系统内,被常任理事国否决的议案有专门的统计,参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公开会议上所投的否决票》,<http://www.un.org/zh/sc/meetings/veto/>,登录时间:2014年2月20日。

可见,在安理会中,大多数情况下各国能够实现合作。其次,就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和否决票的数量来说,没有哪种投票方式明显高于另一种。下面本文将对具体数据进行描述。

(二) 投票统计描述

1. 关于中国弃权票与否决票的数据

自中国 1971 年 10 月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安理会一共投了 137 次弃权票,9 次否决票。其中自 1971 年至 1981 年,中国共有 71 次没有参加投票。弃权票和不参加投票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客观结果上都不会影响决议案的通过。

不参与投票意味着对组织的不合作态度,而弃权和否决均表明国家对于组织及其规则体系的认可。中国第三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大使在谈及中国的不投票行为时说道:“我们在联合国创造了一个先例:不参加投票。一个赞成,一个反对,一个弃权,都有点进去的意思。不参加投票和弃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进入联合国初期,还不了解,就摸情况。”^①实际上,中国不参与投票并不影响决议案的通过,其效果与弃权类似。在中国不参与投票的 71 个决议案中,只有 4 个决议是因为其他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才没有通过,其他的 67 个草案都顺利通过。由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探究中国在弃权票和否决票之间如何选择,而未参加投票和弃权票在客观效果上一致,所以在做分类的时候,笔者把这些不参加投票的决议案放在弃权票中计算,这样自变量就是一个二元变量,不明确表态和否决票。

2. 自变量描述统计

第一,中国 GDP 变化曲线。中国的整体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根据图 1,我们可以看到,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经济增速较缓;80-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较快;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议题是否与主权安全有关。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按照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会员国申请议案。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新会员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将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推荐并进行决议,因此对于新会员入会问题,常任理事国对此拥有否决权。冷战期间新会员国的入会申请常成为两大阵营对抗背景下的牺牲品。第二类是有关政治情势的决议草案,大多有关地区争端与国内冲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中东争端等问题。第三类是联合国组织及其运作问题,如根据

^① 凌青口述,宗道一、朱礼盈等编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与联合国》,载《党史博览》,2005 年第 4 期,第 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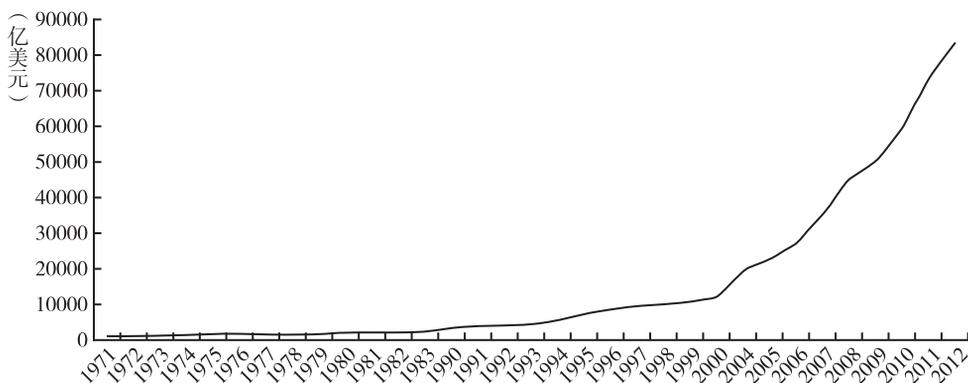


图 1 1971-2012 年中国 GDP 总额的变化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规定是否向大会推荐秘书长人选等问题。本文所研究的安全类议题是第二类中涉及主权国家军事安全和政治冲突的议案。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 1 中的统计数据不包括涉及国家内部人权问题的议案。

中国向来对国家主权与安全比较敏感,对于涉及干涉他国内政的事务尤为谨慎,对于大国军事干预小国的内部事务通常持保留态度。根据表 1,我们可以看到,1971-2000 年,中国所投弃权票多于否决票,而 2001-2012 年,则是否决票多于弃权票。

表 1 中国对主权/安全类议案投弃权票或否决票的情况

年代分类 \ 投票类型	弃权票	否决票	总计
1971 年 11 月-1980 年	59	1	60
1981-1990 年	6	0	6
1991-2000 年	18	2	20
2001-2012 年	1	5	6
总计	84	8	92

第三,议题是否有关中东国家。中东问题是安理会决议案中的热点,在中国总共所投的 146 次弃权和否决议案中,有 68 件是关于中东问题的。根据表 2,1971-2000 年,中国对于中东问题基本不明确表态,只有 1 次投否决票,其余均是弃权;2001-2012 年,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弃权票相对减少,共有 9 次弃权,同时使用过 3 次否决权。冷战后,中国一共使用了 7 次否决权,其中 3 次是关于中东问题的。

表 2 中国对有关中东的议案投弃权票或否决票的情况

年代分类 \ 投票类型	弃权票	否决票	总计
1971 年 11 月-1980 年	41	1	42
1981-1990 年	4	0	4
1991-2000 年	10	0	10
2001-2012 年	9	3	12
总计	64	4	68

第四,议题是否与除中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相关。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中国是否对亚洲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对于亚洲事务更加关切呢?当然,由于中东问题距离较远,且纠纷较多,中国可能关注较少。但是对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可能会比较关注,在不同意时会投否决票加以反对。

四 关于中国投票的回归分析

前文对所研究的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我们可以对各变量有初步认识。下面为了判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本文的假设,笔者将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文所分析的问题是何时中国有时选择弃权票,有时选择否决票,这一因变量是虚拟变量,而且本文所分析的时间段为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至 2012 年,因此本文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 Logit 模型,软件为 Stata10.0。

在表 3 中,每个变量系数下面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差。在 Logit 模型中,我们对分类自变量的系数 β 的理解要涉及发生比率(odds)和发生比率比(odds ratio)。发生比率是指出现某一结果的概率与出现另一结果的概率之比。发生比率比是指自变量为 1 时因变量的发生比率除以自变量为 0 时因变量的发生比率,这一比值等于 $\exp(\beta) = e^\beta$ 。^① 在模型一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变量“中东问题”并不显著,因此在模型二中删除这一自变量,发现其他几个自变量都显著,因此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对联合国的熟悉加强了中国否决的可能性。

根据表 3,在两个模型中,中国 GDP 这一变量的系数都为正值,在模型一中为 45.17,在模型二中为 47.70,且 p 值小于 0.01。这表明,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在不同意时会倾向于明确通过否决票表示反对。此外,另一变量“加入时间段”的系数也

^① 谢宇:《回归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36 页。

为正数,模型一中系数为 28.73,模型二中系数为 30.53,且 p 值也均小于 0.01。可见,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增多,社会化程度加深,也容易在不同意时以否决票来表示。

表 3 回归模型

自变量 \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LNGDP	45.17 ^{***} (0.21)	47.70 ^{***} (0.19)
加入时间段	28.73 ^{***} (0.41)	30.53 ^{***} (0.34)
安全议题	13.96 ^{***} (2.37)	14.86 ^{***} (2.25)
是否与除中东外其他亚洲国家有关	16.45 ^{***} (1.48)	16.256 ^{***} (1.09)
中东问题	1.64 (1.51)	
常数项	-630.30	-665.03
LR chi2(5)	37.84	36.39
Prob>chi ²	0.000	0.000
Pseudo R ²	0.56	0.54
Log likelihood	-14.81	-15.53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首先,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中国投否决票的可能性增大。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安理会投过两次否决票,90年代投过两次,而在2007-2012年间就投了5次否决票。这一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阶段性变化。当中国实力达到一定等级时,中国投否决票的次数就会明显增加。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后,中国的否决票明显增多,可见中国投否决票与中国实力的增长具有同步性。

2011-2012年,中国投了三次否决票。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投出的关于中东叙利亚问题的投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赞成俄罗斯对安理会决议案的态度及修改意见。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李保东发言强调,应尽快启动叙利亚人民主导的、各方广泛参与的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应充分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应

使问题复杂化。发言还提到,中国支持俄罗斯提出的修改案文,有成员要求继续就草案进行磋商,这是合情合理的。但遗憾的是,上述合理关切未被采纳,在各方仍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强行推动表决,无助于维护安理会的团结和权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①可见,尽管中国与美国就此问题有不同意见,中国已经拥有自信,敢于公开否决。

反观之前,对于涉及内政与冲突的敏感问题,中国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20世纪90年代往往会选择弃权票。冷战时期,对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往往投弃权票。^②冷战期间,全世界平均每年爆发国际冲突7起;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爆发的频率明显高于冷战期间,平均每年达12起,特别是1990-1992年间冲突总数达55起,平均每年18起。^③有统计显示,90年代是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最多的年代,共爆发战争和武装冲突81起,明显呈上升态势。^④在这些冲突中,南斯拉夫内战是热点之一,中国在安理会对于南斯拉夫的决议草案基本上都投了弃权票,其实其决议草案中所表达内容的性质和2011年、2012年的叙利亚问题都是涉及冲突的政治解决、国家内政等问题,比如对于和南斯拉夫问题相关的决议案S/RES/757(1992)^⑤、S/RES/787(1992)^⑥、S/RES/820(1993)^⑦、S/RES/816(1993)^⑧、S/RES/855(1993)^⑨,中国都投了弃权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投出了45次弃权票。^⑩

近期的叙利亚问题与以往的中东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在性质上接近,但是中国前后的态度却出现了弃权和否决的不同。根据对上述案例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实力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对于有保留意见的决议案更倾向于用否决而不是弃权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① 会议发言参见:《安全理事会第六一七七次会议逐字记录》,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711,登录时间:2014年1月10日;《安全理事会第六六二七次会议逐字记录》,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627,登录时间:2014年1月10日。

② 例如,关于冷战前中东问题的决议案有S/RES/426(1978)、S/RES/350(1974)、S/RES/434(1978)。

③ 邢爱芬:《冷战结束十年来国际冲突回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第25页。

④ 李晓鹏、黄瑾:《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冲突: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6期,第11页。

⑤ 决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安理会第757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757(1992),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0日。

⑥ 决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安理会第787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787(1992),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0日。

⑦ 决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安理会第820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820(1993),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0日。

⑧ 决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安理会第816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816(1993),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0日。

⑨ 决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安理会第855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855(1993),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0日。

⑩ 邢爱芬:《冷战结束十年来国际冲突回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第25页。

其次,社会化与环境变化对中国投票的影响。

从时间阶段来看,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投票随着时间推移而愈益坚决的变化:一个是社会化因素,另一个是格局转变带来的国际环境变化。

在国际组织中,成员国之间有规律的持续互动使成员国获得新的认同,进而改变了它们对利益的认知。^①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联合国的制度规范和其他成员国的行为模式对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行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初期的1971年到1981年,对于联合国行事规则还不熟悉,未参加安理会的投票的次数多达71次。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大使解释道:“(我们)从来没参加过联合国斗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尽量还是离远一点,这是必要的。”^②可见,此时中国还是处于组织规范的学习阶段。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时间增加,中国在1982年后再也没有“未参与投票”的行为。正如江忆恩所指出的,中国已经接受了国际规则,并经历了从“体系反对者”、“体系改革者”到“体系维护者”的角色转换。^③

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推进了国际规则、规范在中国的內化。^④随着中国对于联合国规则制度的接受与认同,中国也不再投过多的弃权票。1990-1999年,中国所投弃权票数量为43次;2000-2012年,中国所投弃权票数量为15次。显然,中国投弃权票的数量在下降。

除了社会化因素外,国际格局的变化也对中国投票有显著影响。不同的国际格局带来的体系压力也有所不同。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中国的投票需要兼顾美、苏两方的意见,弃权票是减轻压力的有效选择。即使在此期间中国针对强权政治投了两次否决票,分别是1972年8月关于接纳孟加拉国为会员国和1972年9月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但是中国的否决仅仅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不企图改变美、苏对此的立场。

冷战刚结束时,国际格局由两极变为单极,但是冷战思维并未消失。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承受了较大的国际压力,面临极度的孤立,此时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破孤立。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外交领域做了一些妥协,其部分原因就是

① David H. Bearce and Stacy Bondanella,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cialization, and Member-State Interest Converg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1, No. 4, 2007, pp. 703-733, p. 710.

② 凌青口述,宗道一、朱礼盈等编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与联合国》,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4期,第19页。

③ 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48-53页。

④ Kent Ann,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 No. 3, 2002, pp. 343-364.

为了在国际上争取一定的合法性。^① 这一立场也体现在联合国的投票中,中国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显示合作的态度,避免过多地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在安理会投票中,即使中国持反对意见,很多时候也不得不以弃权来表明自己的保留立场。因此在1991-2000年,中国投了54次弃权票。

进入21世纪,经过外交努力,中国摆脱了孤立的局面,而且九一一事件使得美国的战略重心有所转移,对中国的防范略有减弱。因此,2007-2012年,中国的投票有5次弃权、5次否决,可见中国在安理会总体表现了合作的态度。同时,中国也能够明确用否决票来表达反对意见。

第二,中国对于主权与冲突类议案明显态度谨慎。

根据表3,在两个模型中,变量的系数都为正数,且 p 值 <0.01 ,表明议题内容对中国投票有显著影响。若议题与主权或安全有关,中国在不同意时会倾向于投否决票。

本文衡量某一议题是否属于安全类议题时主要看议案的内容是否涉及军事方面,例如主权内政问题、国家间冲突、内战、军事介入等议案均属于本文所界定的安全类议题。中国一直强调国家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反对大国干涉别国内政。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道义上也肩负着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的责任。因此对于大国干涉小国、发达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的议案,中国非常敏感。纵观中国在安理会的所有否决票,大致都与干涉他国内政和武力介入等事宜有关。

我们可以从中国否决孟加拉国为新会员国一事看出中国的谨慎。1971年11月21日,印度未经宣战而向东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1971年12月4日,美国在安理会提出了要求印巴停火和印度撤军的提案,苏联予以否决,致使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12月6日,印度率先宣布承认孟加拉国。12月7日,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要求停火的2739号决议,但未能阻止印度进攻。直至12月16日,印军占领了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在东巴的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军投降后,印巴才实现了停火。12月21日,安理会以13票多数通过307号决议,要求印巴双方按《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战俘,实现和解。1972年1月,原东巴地区正式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宣布脱离巴基斯坦而独立,孟加拉国独立初期同印度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苏联政府及其追随者于1972年8月在安理会提出接纳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并且不顾多数国家要求推迟审议的合理意见,坚持要进行表决。因此,1972年8月25

^① 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46-83.

日,中国否决了苏联、印度等国关于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① 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关于印巴停火的决议案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因为印度仍未按联合国决议从东巴撤军,并扣押了九万多巴基斯坦战俘和平民。为了推动有关各方贯彻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中国主张推迟讨论这一议题。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挑起针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这首先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难以让中国接受。而且通过印巴战争,苏联的实力已经深入南亚次大陆,这些因素不可能不影响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中国对于主权和干涉问题的态度与本国经历有关。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西方自由国际主义者如此频繁地注意并予指责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国家主义’,植根于他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即没有国家就一无所能。”^②因此,“只有通过获得了国家的控制权,并且在别国和国际社会的要求面前维护了国家主权,才能有效地对抗外国的统治,而它们在缺乏这些权利时往往被外国统治”。^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对于主权和冲突问题的关注。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关注主权和冲突类问题,但是中国的立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近些年来,中国在很多涉及主权干预的决议上投了赞成票。而且在一些非洲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否决涉及人道主义干预的很多决议,甚至积极参与其中,如参与组织选举、民事问题和国家安全司法等能力建设。由于本文研究的只是中国的否决票和弃权票,而上述变化体现在赞成票中,因此,本文的数据分析不能反映出中国立场的上述变化。

第三,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关注的是除中东之外的其他亚洲事务,对于中东问题则较少明确表态。

根据回归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中东问题”这一变量的系数为1.64,且p值不显著,议题是否为中东问题对中国是否投否决票没有显著影响。而“议题是否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有关”这一变量的系数在模型一中为16.45,在模型二中为16.256,且p值均小于0.01,可见如果议题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有关,则中国在安理会中投否决票的可能性会上升。

中东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在提交安理会的决议案中,有大量关于中东问题的议案。根据前文的表2,针对中东问题,中国投了64次弃权票,仅投了4次否决票。中国在1972年对中东问题投否决票与以色列的报复行为有

① 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第427-429页。

② Hedley Bull,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terlo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Library, 1984, p.27.

③ Hedley Bull,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6.

关。1972年,阿拉伯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绑架并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1972年9月8日,以色列为报复而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七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叙利亚、黎巴嫩两国和巴勒斯坦四百多人伤亡。同年9月10日,安理会应叙利亚请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袭事件。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接连行使否决权,争论无果而终,提出的议案无一获得通过。中国和苏联认为,“9月8日以色列对阿拉伯的袭击与秘密团体的行动不可同日而语”。这表明,中国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是帝国主义行为,阿拉伯民族极端分子是个别人的行为,中国更加反对以色列的做法。中国还认为该议案没有谴责“以色列的帝国主义”,所以中苏两国不约而同地在S/10786 para 2决议草案上行使了否决权。^①除了这次之外,中国关于中东的另外三次否决票分别是2011年的S/2011/612^②、2012年的S/2012/77^③和2012年7月19日投票。

在有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议案上,中国会投赞成票来支持问题的解决,比如2006年关于黎巴嫩的决议案S/2006/508^④:决议案严重关切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谴责占领国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进攻,致使数十名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大量巴勒斯坦财产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巴勒斯坦民主选举的官员和其他官员被拘留。虽然这一决议案因为谴责以色列遭到了美国投否决票,但中国还是投赞成票表示支持。可见,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没有参与到大国间的相互争夺中去,并不像美国等国由于深入介入中东而导致立场偏袒。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指出,中国积极推动巴勒斯坦和平解放事业的立场从未改变。中国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支持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即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之初,中国就已有明确的态度——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中国对中东和平进程并非“过去不关注,今天突然热心”,而是立场从未改变。^⑤在中东问题上,相较于否决票,中国的弃权票数量更多一些,如S/RES/1757(2007)、S/RES/1680(2006)、S/RES/1559(2004)、S/RES/748(1992)、S/RES/493(1981)、S/RES/488(1981)、S/RES/485(1981)、S/RES/483(1980)、S/RES/481

① 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第429-431页。

② 决议草案内容参见:《法国、德国、葡萄牙和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2011/612,登录时间:2014年1月15日。

③ 决议草案内容参见:《巴林、哥伦比亚、埃及、法国、德国、约旦、科威特、利比亚、摩洛哥、阿曼、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多哥、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2012/77,登录时间:2014年1月10日。

④ 决议案内容参见:《卡塔尔:决议草案》,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2006/508,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5日。

⑤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中国中东问题立场从未改变过》,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20/4951453.s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15日。

(1980)、S/RES/474(1980)、S/RES/459(1979),对不同年份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案,中国都投了弃权票。可见在中东问题上,中国有自己一贯的态度和立场,但是在表达反对态度时,总体上看对于弃权、否决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反观除了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事务,中国则对之非常关注。例如,1972年8月25日,对于苏联、印度等国关于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中国投了否决票。对此前文已有描述。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投的两次否决票也与中东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事务有关。当时中国受到了各国的封锁,中国的外交处于被动局面。为了表达合作的态度以争取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安理会投了大量的弃权票,只投了两次否决票,而这两次否决票均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有关。第一次是1997年1月10日,中国在安理会否决了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维和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其主要原因是从1991年起,危地马拉“连续四年帮助台湾地区上演重返联合国的场面,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执意邀请台湾‘外长’参加1996年12月29日危地马拉的和平签字仪式,为台湾当局分裂中国的行动提供空间”。^①中国代表在会议发言中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所有会员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危地马拉政府的所作所为践踏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了联大的第2758号决议,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②在危地马拉承诺遵守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不再与其他国家联合提出旨在帮助台湾地区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的提议后,中国政府于1997年1月20日对授权安理会向危地马拉派遣155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第1094号决议投了赞成票。第二次投否决票是在1999年2月26日,中国在安理会否决了关于将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中国在会议上指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包括预防性部署行动,有始也应当有终。马其顿局势已经明显缓和,与邻国关系得到了改善,该地区有关事态的发展也并未影响到马其顿的和平与稳定。安理会在马其顿建立预防性部署行动的初衷已经实现。在此情况下,显然没有必要再继续延长联预部队的任期。^③虽然发言中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这次的否决票和马其顿在1993年10月与中国建交、又在1999年2月8日宣布与“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不难看出,在涉及挑战中国主权的问题时,中国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

① 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第432-433页。

② 发言具体内容参见:《安全理事会第三七三〇次会议逐字记录》,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3730,登录时间:2013年11月1日。

③ 发言具体内容参见:《安全理事会第三九八二次会议逐字记录》,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3982,登录时间:2013年11月1日。

对于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事务,中国近年来仍十分关注。2007年1月12日,安理会就美国和英国提出的关于缅甸局势的决议案 S/2007/14 进行投票,^①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南非也对决议案投了反对票,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和刚果(布)投了弃权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在安理会发言指出:中国坚决反对安理会通过缅甸问题决议案。中方重申了三点原则立场:首先,同国际社会一样,中方希望看到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的缅甸。其次,中方鼓励和支持秘书长根据联大授权就缅甸问题展开斡旋活动。最后,缅甸问题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王光亚在发言中还特别指出,中国作为缅甸的直接邻国和亚太地区的安理会成员,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丝毫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倘若缅甸局势因外部强行介入而发生动荡,首当其冲受苦的将是缅甸人民和缅甸各邻国。因此中国比其他任何域外国家都更希望看到缅甸局势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② 王光亚在安理会的发言直接表明了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局势的高度关注和敏感,因为周边国家动荡不安或被外国势力干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安全形势。

中国对于中东和非中东的亚洲事务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同,对此,笔者认为可以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原理来加以解释。前景理论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9年提出,他们认为个体对得失的权衡更加注重损失。^③ 1988年,特沃斯基与乔治·夸特罗内(George A. Quattrone)将前景理论的分析由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探讨了选民心理,并发现人民在自己的收益领域讨厌冒险,在损失领域容易接受冒险。^④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用沉没成本来解释前景理论。^⑤ 杰克·利维(Jack S. Levy)用损失厌恶原理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冒险行为,认为在损失领域,一个国家可能会冒险采取行动,以防止现状进一步恶化。^⑥ 根据损失厌恶理论,中国在投票决策中对

① 决议案内容参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2007/14,登录时间:2013年10月1日。

② 发言内容参见:《安全理事会第五六一九次会议记录》,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5619,登录时间:2013年10月1日。

③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292.

④ George A. Quattrone and Amos Tversky,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Political Choi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3, 1988, pp. 719-736.

⑤ Robert Jervi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oss Avers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92, pp. 187-204.

⑥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92, pp. 283-310; Jack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2, 1996, pp. 179-195.

损失与获益的认知是不对称的,损失等量利益比收获等量利益的感觉更加强烈。显然中东问题对中国而言是收益领域,除中东以外的其他亚洲事务则是损失领域。对于中东问题,中国的行为趋于风险规避。但是若涉及中国周边或中国自身,此时中国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面临损失,因此愿意冒险投否决票。

五 结论

联合国自建立伊始,就肩负减少国际冲突、推进世界和平的重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任重道远。根据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在安理会表达反对意见时更加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坚持自身立场和原则的同时能够更加灵活地做出投票选择。2001-2012年,中国共投了13次弃权票,同期美国投了5次弃权票,俄罗斯投了14次弃权票。可见,进入21世纪,中国在安理会投票并非无原则地偏好弃权,而是态度表达日趋明确,会通过否决表示不同意的看法。在各项事务中,中国重点关注的是主权冲突类事务;从地区领域看,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出于损失厌恶心理,更加关注非中东的亚洲国家相关事务。这些特点体现了中国的身份认同和原则立场。可见,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举动不是挑战现状,而是接受现有规范,并且具有“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本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投票时,对于本国所关注的原则如主权等问题,会认为其他国家也很重视这些问题。而且,中国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同,在世界各国事务中密切关注与本国或者邻国安全攸关的事务。

子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①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攸关各国命运。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增大,责任也将增多。在投票时,中国不仅要关注本国利益,也需关注各国的迫切需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如此,在未来的道路上,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如何能够有利于天下,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截稿:2014年1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孔子:《系辞传》。

②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